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对当前大学改革的启示

Cai Yuanpei's Theory on the University and Light on the Present University Reform Shed by It

肖海涛

(深圳大学高教所, 博士 深圳 618060)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 他主持北京大学期间, 被称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这一时期不仅是北大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期, 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时期。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 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可惜的是, 蔡元培这一伟大教育家的业绩和形象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发扬。就是在 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 对他的宣传也很不够力度和完满。

剖析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并用其精神指导当前

的大学改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 我们希望“江山代有人才出”, 时代需要出现更多的蔡元培。

一、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蔡元培身为翰林学士, 饱受儒家思想影响, 同时还做过注重自由研究的中国传统书院的院长; 另一方面, 曾留学德国, 深受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影响。正是这些影响在蔡元培身上的综合, 使他将注

复杂性, 凡是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是简单系统, 不能用还原论方法处理的是复杂系统。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综合集成法, 强调研究复杂巨系统问题必须超越还原论, 强调基于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来解决复杂巨系统问题, 这种观点在科学方法论上与 SFI 观点是相通的。作为一种具有可操性的系统方法和思维技术, 综合集成方法就是基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把不同领域专家掌握的专业知识、各种统计数据资料、专家的实际经验和各种直感式的体会综合集成起来, 从而获得关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整体定量认识。这样的综合集成是社会群体如何从感性认识涌现出理性认识的科学方法, 也属于把握涌现性的方法。

应当说, 这两条路子各有长短。SFI 注重研究系统机理和方法的可操作性, 重视模型方法和计算机模拟实验, 但观察问题的角度往往不够高, 他们倡导的人-机结合未能做到以人为主。中国学者注重探索一个个具体的开放复杂巨系统, 倡导以人为主的人-机结合技术路线, 主张集大成, 重视哲学思考, 观察问题的角度更高些, 但基础理论“味”不够, 缺乏对涌现机制的探索。如果能够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优势互补, 就可能最终找到一条解决难题、实现突破的有效途径。

对于整体涌现性有两种基本的表述。贝塔朗非借用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命题来说

明整体涌现性, 是一种构成论的表述, 即在系统既定的情形下说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不考虑系统的形成、发展、演化。另一种是基于系统的形成、演化、发展来看, 可以把整体涌现性表述为“多来自少”, 或者“复杂来自简单”, 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有生于无”, 这是生成论的表述。无论哪种表述, 如霍兰德所戏说的那样, 都多少带有些“投机致富”的味道, 给人某种神秘感。涌现性来自何处? 这个问题急需有科学的理论解释。

鉴于物质能量的守恒性, 整体涌现性不可能用有关物质能量的科学原理来解释, 需要求助于信息原理, 因为信息具有不守恒性。整体涌现性是通过部分的组织整合而产生的信息增殖、信息创生, 或者说是通过对多样性、差异性的整合而产生的结构特性、组织特性。结构或组织的生灭转换虽然不可能使物质和能量有所增减, 却能够改变物质能量的存在形态, 从而改变事物的复杂性。这正是整体涌现性的本质所在。信息是现代社会用得最广泛的概念之一, 又是今天的科学还远远讲不清楚的概念之一, 围绕信息概念的种种困惑也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拦路虎。为突破系统科学的难点, 要从信息科学的发展中吸取营养来研究整体涌现性, 同时, 随着我们对涌现性的深入了解, 也一定能够深化对信息的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和难题, 拟另文来讨论。

(责任编辑 孙立明)

重伦理的中国古典大学理念与立足科学的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在北京大学这个舞台上融合创新，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也就是这种与时代交融的理念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使北大成为了一所极富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学，成为中国近现代大学史上的一个典范。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大学肩负振兴民族的使命

救亡图存、兴学图强的时代背景很早就使蔡元培认识到，振兴民族与民风，离不开文化教育的根基，而大学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应先把大学整顿好。蔡元培认为任大学校长并非做官、教育可以救国。他说，国家之所以“民俗日偷，士风日敝者，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因此，蔡元培对青年大学生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以“骆驼样的精神”，担负国家的责任。他说：“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的。”

蔡元培强调学生要负起责任，包括对于国家的责任、对于社会的责任和对于学术的责任。并且，在所有这些责任中，“第一是对于学术的责任”。他指出：“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20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作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也正是基于此，蔡元培激励了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蔡元培认为，大学生应以学术研究为天职，而大学则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2.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关于大学的性质，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养成健全人格的地方，而不是混文凭、熬资格的地方。在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后来，蔡元培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他对大学

这一性质的看法。例如，他在1918年的开学典礼上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918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上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在1919年开学典礼上说，“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研究学问的。”

也就是说，大学不是培养官僚的机关，也不是做官发财晋升的阶梯，亦不是贩卖知识、获取毕业生资格的地方，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神圣殿堂。大学生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存在其它的目的。因此，他要求师生把学术作为首要的中心任务，其它任何考虑，如宗派的、学派的或职业的考虑都不可影响学术活动的进行。这是蔡元培有关大学理念的基点，性质明确、名正言顺，对造成北大浓厚的学术空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十分欣赏我国先秦时代思想界所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他认为这是“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造成的结果。他主张，学术研究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允许他们并存，使其有自然发展的机会。他说，“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为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这就鲜明地提出了学术自由的主张。

他认为大学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1930年）中写有“大学教育”一条，其中写到：“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因此，蔡元培希望在北大树立以学术研究为重的观念，形成“为学问而学问”的浓厚学术空气，他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义，提出了“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其本质就是学术自由。这是蔡元培大学理念中的核心内容。

4. 教授治校

大学要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需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需要避免外界对学术的干预,使学术的自由研究得到保障。基于这一认识,蔡元培进一步主张,教育应当独立以及由教授组成评议会治理学校,即大学应由教授治校。这样,治校的大权交给教授会,即使校长换人选,也不因校长的变换造成学校的混乱,并且增加了教授们对于学校的关注与热情。

他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会议制。并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1年换1个校长,还成问题么?”“所望诸君此后,能保持自治的能力,发展自动的精神,并且深信大学组织日臻稳固,不但1年换1个校长,就是1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

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实践,对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北京大学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麇集于沙滩红楼。在青年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真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当时的北京大学可谓人才荟萃、英雄辈出。各家各派都在此找到了发展学术的机会。

其实,蔡元培与北大的关系前后不过10年半,真正亲自主持校务的时间,亦不过5年半左右。然而,他在北大奠定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却一直延续下去,垂诸久远,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一个北京大学的范围。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大学之为大”的理念形象以及一个象征的学术世界。“这个象征的学术世界是百家争鸣,千岩竞秀的世界,它是读书人所永远梦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征的存在也必将是永恒的!”^[2]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对胡适谈起蔡元培时所说的这一段话很有意义。“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

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3]

二、启示与思考

北京大学因为蔡元培创新并实践的中西合璧的大学理念而走向辉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办好大学仍有极大的启示作用。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教育家

北大因蔡元培而兴,表明大学校长作用之大。其实,大学校长如一国之总统,难怪在英文中大学校长与总统为同一个词(president)。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引路人。如果把很有学问很有造诣的教授称为“大师”的话,大学校长应该是“大家”。他集大师的智慧与见识、大将的果断与坚毅以及教育家的魅力与艺术于一身。

大学校长必须懂教育、懂管理。他应深知大学的性质、教师的作用和学生的使命。他应牢记,大学的一切要以学术为中心,不可滥用自己的权力,他的权力只是用来为学校、为教师、为学生、为学术服务的。他不应是一个琐碎的事务主义者,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去框定人们的一举一动,而应激励师生自由地进行学术上的创造。他应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抓住机遇,聚合全校师生员工的力量共同建设大学,并迈向一个共同的远大的目标:研究学问、创新文化、创造未来。

可惜,今天再也没有出现蔡元培第二、第三……为什么?恐怕缺的不仅仅是蔡元培式的人物,需要从更深层面(包括体制的层面、学术的层面等)进行反思。

2. 大学校长及大学应有鲜明的办学理念

理念是前进的动力。有鲜明的、符合现代大学办学规律的大学理念,大学才有奋进的目标和力量。可是,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今天的许多大学校长沉湎于琐碎的事务中;抓大事、抓主流的少。这里,笔者无意指责今天的许多大学校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积极奉献,他们的敬业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大学应是广博的知识中心,它是人才的摇篮、创造的源泉和思想的故乡;大学是神圣的精神殿堂,它所弘扬的自由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创新精神是大学历史常新的动力之源;大学充满灵性和文化氛围,校园文化的魅力大器大象,使它彰显出无穷的生机和活力。可是,今天的许多大学管理者没有自己明确的办学理念,人云亦云者多、赶潮流者多,事务主义者多、搭花架子者多。

3. 学术自由

大学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

论大学的品牌

——兼论我国高校合并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

On the Mergence of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op-Grade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袁本涛¹ 江崇廓²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 博士¹; 所长²、教授 北京 100084)

大学亦如企业, 需要创建自己的品牌。然而大学的品牌却又截然不同企业的品牌, 因为企业的品牌在一定质量条件下, 凭借现代传媒, 加强宣传攻势, 就能产生商品的广告效应, 甚至一夜之间便能家喻户晓。然而大学的品牌却无法在短期内形成, 尤其要形成名牌则更非一日之功, 它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苦心经营、呕心沥血。但我国高校长期以来不太注重自己的品牌建设, 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实行高校合并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 有些大学却在不经意中丢掉了自己数十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品牌, 甚至是著名的品牌, 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注意的事情, 本文拟就此略陈管见。

一、大学的品牌及其形成

如果我们进行一项社会调查, 也许很多中学生

的真谛, 尊重学术自由以及尊重教师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术自由可激发学者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勇气。正如德国著名学者雅斯贝尔斯所说: “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的观念, 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 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 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真理为己任, 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可惜, 今天的许多大学办得不像个学术机关, 而近于行政机关。学术空气淡薄, 长官意志浓厚, 管理干部和其他职员甚至多于教师, 导致行政机关膨胀, 以至有一种形象的说法: “校长一走廊, 处长一礼堂, 科长一操场。”此种现象不可以再继续下去。

4. 现代大学不等于西方大学

蔡元培在接受西方某些大学观念的同时, 也很注意保护国粹——揭国粹之真相, 保中国传统的根。在经济日益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 我国的大学更应该面向世界, 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不断增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但同时也应切记, 只有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有机结合, 大学才能造

都不知道英国的首相是谁、也不知道美国的总统为何人、更未听说过日本天皇的姓氏, 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他们中间鲜有不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的, 就是我国的北大、清华等名校也可算是家喻户晓的。这就是大学的品牌效应, 因为这些大学的品牌是如此著名, 以致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的学人都对它们充满了景仰之情。有一位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被数百家大学和社会团体邀请作讲演, 但他只去了哈佛, 有记者问他为什么, 他用了一句老话回答说: “因为哈佛就是哈佛。”据说, 有一位颇有名望的学者曾忿忿不平地抱怨到: “每当我身边出现哈佛来的同行时, 我就感觉不自在。我知道自己哪儿也不比他们差, 而且他们之中有好多人是名副其实的蠢驴, 可他们胸前的身份牌好像使任何人都不如他们。”又传说一个英国记者认为阿列克斯·黑利的著名小说《根》与史实

就民族的脊梁, 也才能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试想, 如果中国有那么一批既有学贯中西的深厚理论功底, 又了解国情、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大学校长和高等教育专家来办大学, 中国的大学教育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奇迹?! 中国要办世界一流的大学, 必须要有创新的现代大学理念, 必须要有创新理念的校长和教育家!

时代呼唤更多的蔡元培! 时代呼唤更多的教育家! 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教育家!

参 考 文 献

- [1] 蔡元培全集, 1~6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 [2] (香港) 金耀基. 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蔡元培先生新墓碑落成有感 (1978), 载《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
- [3] 高平叔.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百年校庆特刊)

(责任编辑 肖庆山)